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贾根良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贾根良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在现代演化经济学诞生 30 年之际,本书探讨这种科学新范式所面临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阐释作者关于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造性综合的设想,提出中国演化经济学界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本书主要是从作者 2004 年出版《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之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不仅汇集了作者对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在把演化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上的最新研究进展,表明了作者有关中国演化经济学独立自主发展的学术理念和不懈追求。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类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及相关研究人员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贾根良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03-033501-2

I. ①演… II. ①贾…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9478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350 000

定价:62.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陈 劲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执行主编:王焕祥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嘉兴
学院商学院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包国宪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陈 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何自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孟 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汪丁丁 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沛民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吴贵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丛书序一

有幸应邀为这套“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作序。也许没有必要提醒中国读者关于变化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历了众多且巨大的经济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战略下的发展与市场扩张正激励着根本性的技术、制度与社会转型。

为了能够直面一个飞速变化的经济体和动态的全球化世界中的诸多问题与可能性,我们需要一种可以表达当今我们所目睹的根本性制度与技术转型的经济学。不幸的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大都指向静态、均衡的“结果”。即使是增长和动态因素被引入主流经济学模型,它仍然假定个体存在一个偏好不变的函数。因此,个体的教育与发展这一关键特性被忽略了。

幸运的是,演化(包含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替代性研究,其中技术与经济变化是表述的中心。这些研究均可被交叉追溯至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纳尔逊和温特在 1982 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又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冲击。目前,演化与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形成一个广泛的全球网络,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中国学者。

在这个学术网络内,存在着一个由不同分析方法构成的多样化。不过,他们同时分享着几个共同的假定。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经济变化频繁的世界。但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数量或参数方面,它还包括了技术、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正是因为涵盖这种质变的能力有限而被批评。

第二,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奇的产生。由新奇和创造性而来的多样性及其保持是当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主题。新奇驱动技术与制度演化,但其本质是不可预测性。结果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家普遍对预测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是典型地建立在对新奇、不确定性和意外忽略基础上的。

第三,演化经济学家尤其强调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尽管复杂性存在着不同的定义,但大都包含了一个关键性的思想:具有不同特征的实体间的因果互动。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非线性的和混沌的互动进一步限制了可预测性,它们创造了突现特征与进一步新奇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新奇与复杂性的组合使得许多演化性变迁不可逆。

第四,正如达尔文揭示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没有上帝或人为设计而能够突现。演化经济学家吸收了哈耶克和其他思想家的洞见:许多(即使不是所有)人类制度与其他社会安排无需一个整体计划者或蓝图而通过个体互动自发演化。

最后,演化经济学家通常承认构成经济激励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至关重要规则的制度的重要性。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是要建立适合有效的制度,包含能够有效提供激励并拓展机会的规则。正因为如此,从本源和新的分析传统来看,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家的的工作并且与之有所交叉。

演化与制度经济学为解释现代世界提供了一套丰富的资源,它也是一个重要而开放和动态的理论探究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其意义重大。我衷心希望这些著作的读者信心百倍地承担起这项使命。

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发展迅速,已经有了自己的演化经济学会。“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由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精心策划、资助和推出。该中心是中国演化经济学会秘书处所在,中国第一份宣传和倡导演化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办于此。我衷心地希望演化经济学能够像此地的民营经济一样蓬勃发展起来。

杰弗里·M. 霍奇逊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2011年1月25日

丛书序二

演化经济学致力于阐释一个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以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技术进步、产业变迁和制度创新发生的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演化过程。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技术、结构和制度变迁。

马克思一般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凡伯伦开创了普遍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使其成为制度演化分析的本源;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则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后来,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成为演化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并成为其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演化经济学具有“老的”特征,主张避免使用抽象的理论原理,偏好于某种与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相容的归纳的和跨学科的经验主义方法;而80年代以后“新的”演化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与复杂科学的结合,在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一种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新范式,被经济学界某些学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并列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潮流之一,不仅对经济学,而且也对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比较普遍的影响。新演化经济学试图抓住传统科学的目标,但他们达到目标的途径截然不同,即更加追求通过运用简单的分析原理,理解复杂现实中的时空型态。

按其应用领域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细分,目前在演化经济学中已经形成了创新经济学、演化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演化产业经济学等独立的研究分支,具有非常广泛的发展前途。在方法论上,演化经济学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整体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生产力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上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就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演化论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都已经成立了演化经济学会,每年举行年会,并出版专业期刊,其学术力量与影响日益成长。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与产业技术变迁的历史潮流中,加之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故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演化

经济学的发展显示出了高度的热情,演化经济学学术氛围日益浓厚。自2008年以来,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年会秘书处常设于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宣传和倡导演化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也于2008年创刊。

从国际演化经济学思潮的发展来看,中国学者有望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与西方学者获得平等的学术话语权。演化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遇。首先,它不断地吸收现代哲学、生物学和复杂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新思想和新方法整合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吸收程度是其他两大经济学体系远不能相比的;其次,它对推动经济学等学科的多元主义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其研究框架、思想和方法使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倍感新奇和富有启发。例如,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吸收演化经济学的成果,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再次,它为解决中国目前急迫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江泽民同志1998年提出了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和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创新型国家的思想就直接来自于演化经济学,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对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最后,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领域,目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队伍还相对弱小,但这对经济学研究比较落后的我国来说,却提供了在世界上后来者居上的难得机遇。中国学者在演化经济学的某些领域,例如用演化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劳动分工的起源和经济波动的本质,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无疑,演化经济学(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应用到与西方文化传统相当不同并经历了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东方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学术传统与演化经济学不断吸收的现代哲学具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对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某些挑战,所有这些都为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西方学说引入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不立足于国情的理论照搬在理论上难以创新,在实践上也颇具问题;当然,不将本土研究置于国际视野中同样也意味着诸多潜在危机。因此,我们与国际演化经济学界携手举起演化经济学的学术旗帜,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都内在地包含着学术自主创新的理想与目标。我们不仅主张建立具有中国原创性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更加主张直接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倡以案例和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创新。

基于上述国内外学术发展与实践背景,为了推动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与发展,加强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和理解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与中国演化经济学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之后,决定隆重推出第一套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丛书的著作者几乎囊括了我国早期演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和后起之秀。丛书题材则集中反映了我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者近十年来潜心研究的努力,希望它有助于广大学者、学子走近并理解演化经济学,投身于具有中国原创性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之中去。

陈 劲(浙江大学)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1月

前言

两年多前,当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年会决定出版《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时,我给自己拟定了撰写《演化经济学:重新定向经济学》的研究计划,但由于我的大量精力投入到翻译工作和对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这个计划就搁浅了。在收录到本书中的论文中,除了两篇旧文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论文是我这两年间为原先计划的专著准备的,而其他的论文则是从我在《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1]的著作出版后发表的演化经济学论文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笔者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版一本运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因此,本书只选编了笔者在这方面的两篇论文。在这个前言中,我首先阐述演化经济学的性质及其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然后论述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而演化经济学又为什么是其主要构成部分。然后,笔者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势,在此基础上,扼要说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最后,则对本书体系结构的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做一简单说明。

一、演化经济学的性质及其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

演化经济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扩散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新范式。与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比较,这种经济学新范式在其研究纲领上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以创新竞争而非以价格竞争为核心;以资源创造而非以资源配置为核心;以生产为核心而非以交换为核心,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参看表1。

表 1

项目	西方主流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
本体论假定	同质性假定	多样性假定
	人性假定:自利(利己)	人性二重性(利己和利他)、创造者
	个体主义(原子论)	个体能动性 with 制度结构相互构成
	确定性、时间可逆、均衡	不确定性、时间不可逆、非均衡
	物理学隐喻	生物学隐喻

续表

项目	西方主流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
理论体系或研究纲领的特点	资源配置的经济学	资源创造的经济学
	理论体系以交换为核心	理论体系以生产为核心
	价格竞争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创新竞争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理论和政策的普适性特点	理论和政策具有时空特定性的特点
方法论特征	还原论	系统论
	以演绎主义为基础的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模拟	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比較的、历史的、制度的、统计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

目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者仍把演化经济学看作是一种与行为经济学或者实验经济学相类似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它的价值。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创始者凡伯伦在 1898 年创造的,他的目的是要运用达尔文主义革命重建经济学。从其科学性质上来说,演化经济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科学新范式。达尔文革命和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在西方世界催生了有机的、系统论的和动态的世界观,现代演化经济学就建基于这种新的世界观之上。与演化经济学相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仍是以机械的、还原论的和静态的世界观为基础,这种经济学无法处理经济系统的许多关键性特征,如多样性、新奇、彻底的不确定性、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协同效应等问题。因此,在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经济世界,这种经济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现实呼唤一种新型的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演化经济学主要是一种科学新范式,而非一门定义狭窄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其次,从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其先驱可以远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因而是一种要比前两者在历史上更为悠久的经济学范式。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被远溯到亚当·斯密(以及重农学派)和马克思,而同样在经济思想史中作为经济学大师级人物的凡伯伦和熊彼特则没有得到同等重视。但实际上,凡伯伦和熊彼特则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还综合了马克思、凯恩斯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等西方异端经济学其他学派的重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虽然马克思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且,凡伯伦和熊彼特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是,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仍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非常丰富的研究视角、分析框架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它实际上是一种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与前两者

具有高度统一的分析框架不同,目前演化经济学的众多流派仍处于相对分裂的状态,缺乏一种严密的分析框架和系统的知识体系。

最后,演化经济学还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种跨学科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并与之互动中得到发展的,它广泛地吸收了进化生物学、自组织理论、协同论、复杂系统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跨越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许多学科。实际上,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最早被引入到中国发生于管理学科的应用研究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国科技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演化经济学的这种跨学科和交叉研究方法为我们应对当代世界的许多重大挑战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例如,演化经济学家博尔丁不仅是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而且他还与同为演化经济学家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共同成为生态经济学的奠基者。因此,演化经济学理应在资源、环境、生态、循环经济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性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日益凸显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理论的不断反思,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专门设立了一个“新时代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并于2010年12月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创造性毁灭:把创新置于进步经济学的核心》。^[2]在该报告的前言中,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受到了演化与复杂性经济学^①的挑战,社会进步主义者对经济政策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提出了质疑,本研究报告着重通过正在形成的诸如复杂与演化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思考对此进行了回答,并探讨了目前的英国正在发生那些创新性的变化以及英国如何应对的问题,该报告还清晰地勾画了进步主义者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进步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其诉求在目前的世界经济中具有合理性。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影响,目前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三大结构性失调:资本与劳工之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金融资本支配和控制产业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显而易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之中,世界乃至各国经济亟需重大的制度改革,经济政策的焦点正在发生转移,相应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世界也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见表2^[3],而它的关

^① 在演化经济学的定义中,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包括复杂性经济学。

注焦点基本上都与演化经济学有关。

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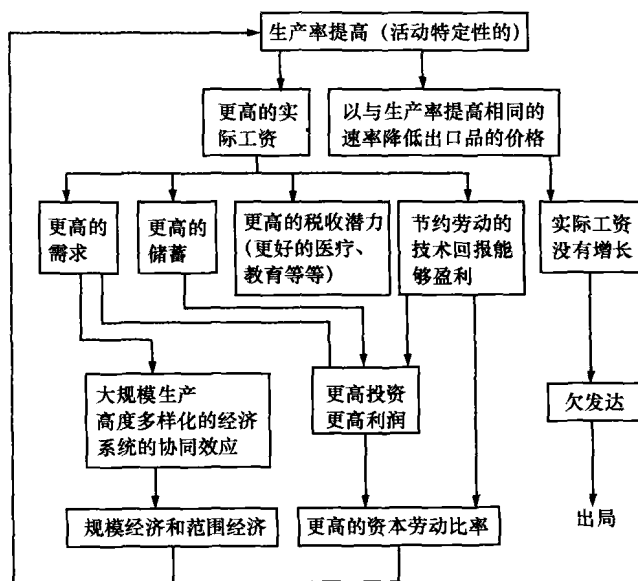
国际金融危机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资本	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经济	实体经济
经济活动在质上是类似的	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
GDP(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工资
国际贸易	国民经济

第一,正如挪威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指出的,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与已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关的交换理论,它根本不能解释生产条件多样性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定价行为的影响;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研究纲领,演化经济学已经变成探索技术和生产“黑箱”的经济学分支。演化经济学曾以研究科学、技术和创新经济学而著名,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我国,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8 年提出的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和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6 年提出我国要在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其思想就直接来源于演化经济学;而如果不具备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我们就无法深入理解温家宝总理在 2010 年提出的“创新驱动的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研读过弗里曼、卢桑和佩蕾丝等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或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讨论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将会不得要领。

第二,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是世界经济无法回避的大趋势,虽然新自由主义和美元霸权仍在阻碍这种转变。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早在 2008 年就已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把投资引向了金融赌博,对生产企业产生了短期视野的压力,堵塞了目前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道路,并有可能产生类似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全球大衰退。因此,佩蕾丝指出,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由信息革命的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转折点上,转折点的重要制度变革就是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控制权,我们必须把投资和创新从金融赌博中拯救出来,使其进入生产和实体经济,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机!^[4]

第三,演化经济学认为,实际工资而非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对经济活动不同质量的区分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只有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才能带来国民财富和国民实际工资的提高,从而真正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图 1);国穷国富的基本原因是一国的发展战略对低质量经济活动或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的结果。

第四,国民经济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仍是欠发达国家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首要原则。

图 1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5]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国内经济一体化要比国际一体化重要许多倍。例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在新自由主义已经兴起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无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不能用工资率、价格或汇率来解释,技术领先使一个国家具有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由于国际贸易的不均衡将持久存在,因此,对落后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学说是适当的。^[6]2007 年,演化经济学家西莫里、多西、纳尔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指出,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并将继续是正确的:成功的经济追赶需要某种类型的幼稚产业保护和其他形式的国家支持。^[7]

三、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与上述经济政策关注焦点的变化密切相关,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也进一步地从基础理论转向了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通过阅读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笔者归纳出以下四个新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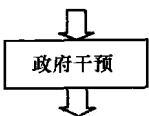
首先,演化经济学将成为 21 世纪的三大经济政策范式之一。在西方世界,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这两大政策范式支配了 20 世纪的经济政策思维。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是最优的、市场不需要改进,因为它天生是稳定的和自动调整的,市场提供了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挑战了这些观念,论证了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把萧条的经济从高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危机中,新自由主义兴起了。然而,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遭到惨败,凯恩斯主义又再度开始复兴。

但是,使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其自身而言也无法保证创新和高增长的经济,它虽然是必须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因为如果缺乏创新作为其基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框架,一国经济最终都无法获得成功,20 世纪占支配地位的两大政策思想学派都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的动力学——创造性毁灭过程^[2]。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忽视了前面谈到的世界经济的严重三大结构失调特别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采取的货币扩张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问题,世界经济体系面临着潜在的重大危机。这说明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前面谈到的演化经济学在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它在 21 世纪将成为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相并列的三大经济政策范式之一。

其次,欠发达经济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有可能出现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主要基础的发展的“新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家创新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演化经济学为主要基础,目前一种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新共识”在国际上正在逐步形成,这是一种以能力建设和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的“新共识”,参看下表。

“华盛顿共识”与发展的“新共识”的对比^{①[3]}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以演化经济学为主体的发展的“新共识”
分析:	
• 市场失败	• 发展=结构变迁;追赶=分工的多样化和高质量经济活动居核心地位
外部性(在发展中国家盛行)	• 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次的集体学习和良性循环
报酬递增(追赶的核心)	• 集中在国内能力的积累
不完全信息(在真实世界中是盛行的)	• 演化=复杂性、渐进、非线性和路径依赖 • 学习与生产结构的共同演化 • 复制、模仿、适应和创新
 政府干预	

①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图表来自于国际劳动组织就业部执行主任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2011)^[9]的论文第 7 页,“以演化经济学为主体的发展的‘新共识’”根据该文第 10 页的两个表格综合整理而成。

- 政府失败
- 近视的政府官僚
- 腐败
- 寻租
- 被私人部门所虏获

政策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不擅长挑选赢家 • 有效率的、祛除腐败的公共部门 • 庇古税和补贴是好的 • 好的政府：私有产权、能动性的环境和降低不确定性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作用=在学习主体间创造学习、接合和网络化的条件 • 建立公私交互作用的协调性论坛 • 强制学习和增长联盟 • “生产率爆炸”的组织能力 • 好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发展型政府” |
|---|---|
-

指导原则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使价格正确” • “使政府让路”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使经济活动正确” • “使学习过程正确” • “使政策过程和制度正确” |
|--|--|
-

再次,扩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范围并通过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为其提供宽广基础是一个潜在的发展新趋势。进入 21 世纪以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的扩展,但目前的演化经济学界由于研究队伍的弱小,因此往往集中于某些主题,虽然在这些主题上如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它远远不适应现实问题对其发展提出的要求。正如德国经济学界元老乌尔里希·维特所呼吁的,演化经济学界要超越基本上是经典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技术变革理论的竞争者这样的新熊彼特主义论题,使长期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些主题回归演化经济学研究的议题(维特,2010)。^[10]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不仅可以突破演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局限性,而且还可以通过建构演化经济学系统的知识体系,推动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例如,杨格定理、金融不稳定学说和产业价值链分析等,由于都属于系统论和历史分析而不能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但完全可以融入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之中。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将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更全面和更系统的分析框架(贾根良,2011)。^[11]

最后,金融问题特别是主权信贷以及金融如何为创新和实体经济提供廉价融资问题将成为演化经济学新的研究重点。凡伯伦对金融资本曾有深刻的见解,而信贷或者说金融问题也曾是熊彼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但在战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除了佩蕾丝和近年来个别演化经济学者对此有所探讨

外,金融问题无疑被严重地忽视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演化经济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在美国演化经济学会 2012 年 1 月将要召开的“大萧条的根源和相关问题”的参会论文中,货币金融问题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又如,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著名金融专家克莱格爾(Jan Kregel)获得了美国演化经济学会 2011 年度的“凡伯伦—康芒斯奖”,这不仅标志着演化经济学对金融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且也标志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综合进演化经济学的新趋势。^[12]

四、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的性质来看,它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新范式,而且也是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它还是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在生态经济学中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演化经济学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演化经济学在 21 世纪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早在 1890 年,即使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者,马歇尔就已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13]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也曾预言到,“在 21 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14]按照异地物种形成原理,虽然我国演化经济学界在国际学术界是后来者,但由于我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制度和结构变迁,我国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上具有后来者居上的优势。为此,我国演化经济学界目前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前沿性的工作。

第一,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是中國演化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其成就如何将决定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命运。目前,我国面临着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严峻困境,也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挑战,演化经济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因此,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界首要的前沿性工作。

第二,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构建演化经济学统一的理论框架以及对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将是一项艰苦的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继续引进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仍是有必要的,例如,比较系统地吧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凡伯伦—康芒斯奖、缪尔达尔奖和熊彼特奖得主的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第三,按照演化经济学有关,经济学体系的“微观—中观—宏观”思想,在初步综合的基础上,撰写一套适合于大学本科生教学的教科书。这项工作在我国尤为迫切,一套好的教科书将有助于解决演化经济学传播缓慢、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难以深化以及不利于对经验研究进行协调等诸多问题。

第四,加强原创性的理论创新。西方演化经济学在经过 30 年的迅速发展之后,在进入新世纪后似乎出现了重大理论创新乏力的迹象。笔者认为,西方演化经